

# 明堂式道教建筑初探 ——明世宗“神王”思维的物质载体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Daoist Architecture in the “Bright Hall” Style:  
The Tangible Carrier of the Ideology of “King of All Gods” of the Ming Dynasty  
Shizong Emperor

陶金 喻晓

*Tao Jin Yu Xiao*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7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七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明堂式道教建筑初探

## ——明世宗“神王”思维的物质载体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Daoist Architecture in the “Bright Hall” Style: The Tangible Carrier of the Ideology of “King of All Gods” of the Ming Dynasty Shizong Emperor

陶金 喻晓

Tao Jin Yu Xiao

#### 内容提要：

明世宗以明堂的名义修建天坛大享殿，作为“大礼议”中促成生父祔庙的重要因素。此后，他又以明堂形制建造了大高玄殿乾元阁、西苑崇智殿、大光明殿等一系列道教建筑，在为玉皇祭祀赋予崇高意义的同时，借此展开自身形象重塑。本文从明世宗所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宗教信仰、执政理念等角度入手，综合利用史志文献、道教经典和建筑图像等多种材料，阐述明堂式道教建筑内涵，揭示其作为明世宗“神王”思维之物质载体的本质。

#### 关键词：

明代 世宗 祭祀 道教 建筑

####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Shizong Emperor (r. 1522-1566)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commissio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ll of Great Sacrifice (*Daxiang dian*) in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the name of building a “Bright Hall” (*ming tang*)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successfully including his deceased biological father in the worship of imperial ancestors during the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conflict. Following that, the emperor continued to commis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oup of Daoist architecture in the same architectural style, including the Belvedere of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Qianyuan ge*) in the Temple of Immerse Heavens (*Dagao xuandian*), the Hall of Revered Wisdom (*Chongzhi dian*) and the Hall of Great Brightness (*Da guangming dian*) in the West Gardens, applying paramount significance to the worship of the Jade Emperor and at the same time re-projecting his personal image. With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lassic Daoist doctrines, and architectural pictur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hizong Emperor’s historical background, personal experience, religious belief, and political ideology, discusses the hidden meanings of the Daoist architecture in the “Bright Hall” style, and discloses the nature of these halls as the tangible carrier for the ideology of “king of all gods” of the Shizong Emperor.

#### KEYWORDS:

Ming dynasty, Shizong Emperor, worship and sacrificial ceremony, Daoist religion, architecture

从嘉靖十五年（1536 丙申）开始，明世宗朱厚熹主持修造了一系列圆形攒尖顶建筑，其中大多是举行斋醮仪式的道教建筑。而它们的建筑原型（prototype），却是依照儒礼中“明堂”概念所建造的上帝祭所——天坛大享殿（今祈年殿）。建造明堂大享殿，是明世宗“大礼议”及国家祭典改革的关键一环；“明堂式”道教建筑，则是明世宗执政中后期崇信道教的重要体现。这种建筑形制被明世宗分别应用于儒、道两种语境中，表现出其 45 年执政生涯虽曲折多变，但仍包含某种一贯性。

前人著述中，多指出明世宗的崇道是“大礼议”后君权空前膨胀的一种反应。无论对“大礼议”褒或贬，学界对其崇道普遍持否定态度。事实上，明世宗的崇道与明代皇室传统及其少年经历有密切关系，也是其以“大礼议”为开端的改革的后续，更是在三教合流时代背景下，追求“神王二道裁理天下”<sup>1</sup>境界的具体表现。所谓“明堂式”道教建筑，正是这一切的物化载体。

## 一 神王思维与明堂式道教建筑产生的背景

### （一）祭天与明堂政治内涵

华夏文明最古老的本土宗教是对自然力量的公共祭祀，至晚在商代就已经正式形成<sup>2</sup>。这种“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sup>3</sup>在后世被儒家摄受，并受道教影响。该宗教的至高神“天”具有情感、有一定的人格化<sup>4</sup>。比“天”的人格化更进一步的是“帝”，“帝”字的卜辞、金文皆作花蒂之形，寓意生养。自西周始，君王祭天成为人天互动几乎唯一的方式。除祈求恩典之外，更有获取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的诉求。儒家继承并发扬周礼，强调“天命”，天与君王建立起亦父子、亦君臣的关系。此后，董仲舒进一步构建“天人感应”学说<sup>5</sup>。天以灾异来警示、惩罚失德之君，以祥瑞来褒奖有道之君；君王则通过祭天来表达感谢或内疚。在一次次祭天中，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得到反复、持续的固化。

明堂与圜丘都是重要祭天场所，但与圜丘不同，明堂功能更复杂，其根源是发轫于原始社会氏族首领聚会议事并举行祭祀的“大房子”<sup>6</sup>。明堂作为建筑，被赋予了宇宙观模型的概念，其正方形与圆形的建筑形式与天道运转的时间、空间序列相对应，不同区域依据方位被赋予不同的功能，以彰显天子执政天人一体的合法性；其中央区域用以祭天，并配以祖宗，用来彰显天子以天为祖的合法性<sup>7</sup>〔图 1〕。借由明堂，皇权合法性获得了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后世一些帝王师法周礼，以建造明堂作为其皇权合法性的象征。迄今为止，文献与考古可以共同印证的明堂遗址共 4 座，分别为西汉末年王莽明堂<sup>8</sup>（陕西西安）、东汉光武帝明堂<sup>9</sup>（河南洛阳）、

1 见于《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三，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对“神王二道”这一概念，后文将有详述。

2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上），《历史研究》1959 年第 9 期。

3 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第 1 期。

4 《诗·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5 《春秋繁露》卷十三，同类相动第十七。

6 沈聿之：《西周明堂建筑起源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 年第 14 卷第 4 期。

7 《孝经》：“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8 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察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3 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196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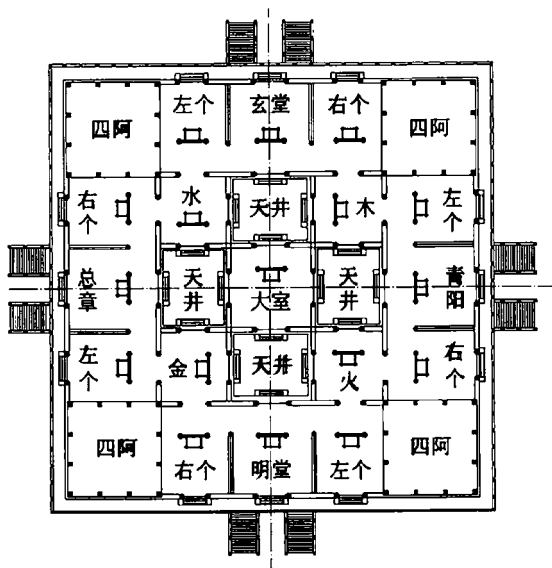


图1 明堂图 采自王晓明《吕氏春秋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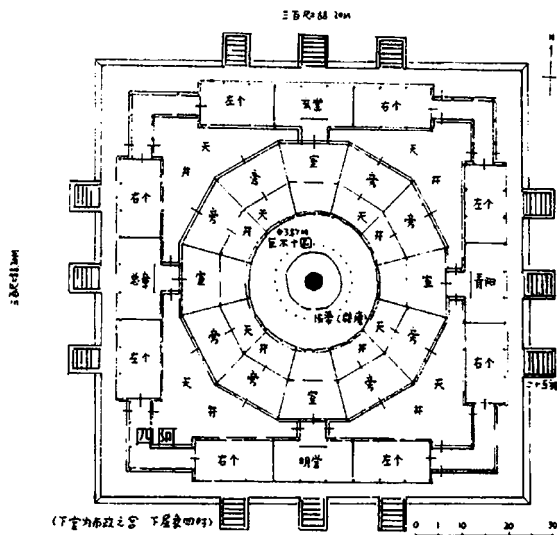


图2 河南洛阳武则天明堂遗址复原平面图

北魏孝武帝明堂<sup>1</sup>（山西大同）、唐代武则天明堂<sup>2</sup>（河南洛阳〔图2〕）。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乙巳），明世宗亲自策划的大享殿（今北京天坛祈年殿）竣工，这成为了中国现存的、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座明堂。

关于明堂的研究与论述汗牛充栋，清儒惠栋有《明堂大道录》<sup>3</sup>传世，民国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sup>4</sup>，此类研究大都围绕明堂的功能与含义展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几处明堂遗址逐渐被发掘，明堂功能的阐释更加深入全面。其中，旅美学者巫鸿建设性地指出了王莽明堂所具备的赋予未来君主合法性的角色<sup>5</sup>。

## （二）玉皇与昊天上帝的融合

虽然唐代的道教文献中已出现有关玉皇的文字记载，但真正确立下来的祀典还是在北宋太宗时期<sup>6</sup>。大中祥符年间，“圣祖”降天书于汴梁皇宫，言明自己是受玉皇之命下降为赵氏始祖，总治下方<sup>7</sup>，并要求如同唐朝的“玄元皇帝”那样受到恭奉。为此，宋真宗在新建成的玉清昭应宫内专门设立了圣祖殿以及供奉玉皇的太初殿，并举行了与祭天同规格的上圣号祭典。这与泰山封禅祭天等宗教活动一样，都是以兵变夺位的赵宋皇室为寻求统治合法性、神圣性所作的努力。

政和六年（1116丙申），笃信道教的宋徽宗下诏书，表达了他对昊天上帝与玉皇大天帝“主宰万化，名

1 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

3 惠栋：《明堂大道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4 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第123页，中华书局，1961年。

5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231～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第73～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钦若：《翊圣保德传》卷上，收入《道藏》正一部，册32，第651～65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7 《宋史》卷一〇四《志》第七十五《礼》七，第2541页，中华书局，1977年。



图3 故宫钦安殿藏北宋政和六年宋徽宗御题加上玉皇圣号玉简

殊实同”的认知与忧虑，并决定将真宗所上的“玉皇大帝”圣号改为“昊天玉皇上帝”，以此作为调和<sup>1</sup>。稍后，他又将皇地祇的圣号与地域性崇拜中的后土结合，是为“后土皇地祇”。如此，徽宗将玉皇、后土与儒礼中的天、地对等起来，以此将国家宗教祭祀天、地的权威性分享给道教，形成了儒、道两套并行不悖的天地祭祀系统，而徽宗自己“道君皇帝”的身份也因为能够以道教化的方式祭祀天地而得到了进一步完善<sup>2</sup>〔图3〕。

以崇奉玉皇来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做法，被明代奉道君主所继承，明成祖迁都北平府后，便在大内建立玉皇殿<sup>3</sup>。成化十二年（1476丙申），明宪宗曾打算以祭天的祀典来祭祀玉皇，但因大臣的反对而作罢<sup>4</sup>。明世宗继承了前述君主敬奉玉皇的传统，并将其作为自己“神王”体系建构的重要一部分，进而发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明堂式”道教建筑。

## 二 从藩王到“神王”

### （一）时代背景及家庭情况

#### 1. 复杂紧张的君臣关系

明世宗即位时刻恰好位于明朝276年国祚的正中，其前任二帝的历史评价差异甚大：孝宗“恭俭仁至、勤政爱民”，仅有皇后一人而无妃嫔，扭转了成化中后期朝廷乱象；而武宗则“耽乐嬉游，暱近群小”，热衷武功，朝政荒废，全国各地兵变、叛乱频发，国家陷入崩溃边缘。从君臣关系上看，孝宗信赖朝臣，武宗疏远朝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明代朝臣们存在“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的价值取向<sup>5</sup>，武宗历史评价如此之低，与他疏远朝臣有重要关系。也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取向，武宗驾崩后，杨廷和作为托孤之臣立即着手恢复孝宗朝的政治秩序。他拟定了遗诏，选定年少的兴王世子朱厚熜继承大统。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朱厚熜从进宫开始就显示出强烈主见，而后来的“大礼议”更是让杨廷和集团期望全面落空，且逐渐交出权力。

#### 2. “小冰期”带来的气候异常

明世宗崇道的行为在《明实录》等史料中记载最明确、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祈雨（雪）。世宗也曾以为民祈雨（雪）为由反驳文臣对其崇道的批评。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一月的降雪，被认为是世宗斋醮

1 《宋会要辑稿》册三七，礼五十一，第1547页，中华书局，1957年。

2 相关研究参见陶金：《钦安遗珍——钦安殿藏宋徽宗玉简与十二雷将神像画》，《紫禁城》2015年第5期。

3 《崇禎宮詞》注云：“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相顾骇愕，莫敢执奏。像重甚，不可动摇，遂用巨纆曳之下座。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泰西氏之教，以辟佛老，而上听之也。”转引自车锡伦：《泰山“九莲菩萨”和“智上菩萨”考》，《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1999年第2期。

4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六，成化十二年八月乙酉。谈迁《明榷》卷三十七，称“造祭器、乐舞之具”，而非实录中的“取”。

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年，第80页。

的灵验,他表示“朕为民祈祷,非梁武、宋徽比”<sup>1</sup>。根据气象资料,明清之际中国广大地区受到“小冰期”影响,导致当时出现低温、干旱、冻灾,导致农作物减产并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研究北京石花洞的洞穴沉积物,可推断北京及周边地区小冰期的首个冷期为1420年~1589年,并且是近1000年来最寒冷的时期<sup>2</sup>,嘉靖朝(1522年~1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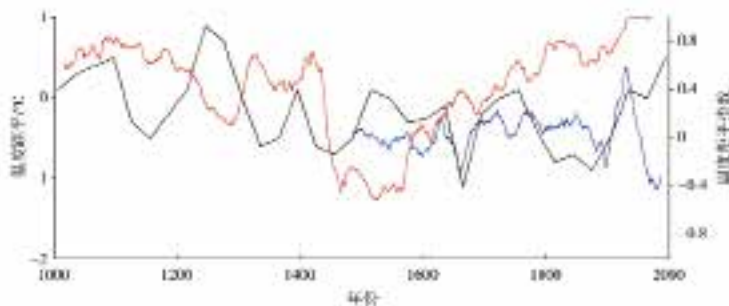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东部地区小冰期时期温度序列,其中红线系利用北京石花洞资料重建  
采自张娟、邵晓华、王涛:《中国小冰期气候研究综述》,刊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5月。

年)刚好位于这一时期中〔图4〕。小冰期在嘉靖朝的肆虐亦有史料支持,如乾隆《盛京通志》:嘉靖四年冬,辽阳、复州、金州大雪深丈余,人畜冻死者甚众;民国《淮阳县志》:嘉靖四十五年正月,黑风昼晦大雨雪。是年正月雨雪七日,雪深丈余。清人傅维麟的《明书·司天志》甚至记载了“嘉靖三十八年六月二日茂州大雪,七月三日复雪”、“嘉靖三十九年六月泗州大雪及雹”这样的极端反常天气。

由小冰期等原因带来的气候异常,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世宗的频繁斋醮。

### 3. 父子深情与家庭信仰

生活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也生活在亲属的包围中,他们比其他人负有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家族繁衍,尽一切可能保持门第、扩大族系<sup>3</sup>。包括明世宗在内的明代君主就生活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中,一方面受自古以来“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sup>4</sup>之影响,一方面受《皇明祖训》中相关条款约束,与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一种制度化的亲情。

朱厚熹父亲朱祐杬于弘治七年(1494)到远离京城1000多公里的安陆(今湖北钟祥)就藩。就藩后的第13个年头(正德二年,1507)朱厚熹出生。安陆州所处的汉水下游地区是著名的孝子之乡,是戏彩娱亲、哭竹生笋、扇枕温衾、卖身葬父等孝亲故事的产生地<sup>5</sup>。兴王对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朱厚熹爱护有加,幼时便“口授以诗”,及长更亲自为之讲解“先王至德要道之旨”<sup>6</sup>。此外,兴王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民间传说中,他的道友纯一道人羽化之时恰巧朱厚熹降生,所以有世宗为高道投生的说法。这一传说虽荒诞不经,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兴王信仰道教;同时,世宗对于这一关于自己身世的说法也是抱以认同的,他即位后还将纯一道人生前居住的玄妙观敕修为元佑宫〔图5〕<sup>7</sup>。父子深情,是此后世宗发动“大礼议”的心理基础,而家庭信仰则是世宗崇道的发端。

1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六。

2 张娟、邵晓华、王涛:《中国小冰期气候研究综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5月刊。

3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第727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4 《汉书·翼奉传》。

5 左攀、贾勇:《孝文化视野下的嘉靖皇帝与大礼仪探析》,《运城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6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

7 《(同治)钟祥县志》、《(民国)钟祥县志》,转引自Richard G. Wang 王岗:《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pp. 149~1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图5 湖北钟祥元佑宫山门

#### 4. 皇室的“少子”与“早亡”问题

朱厚熜之所以能以孝宗侄、武宗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主要原因是明中叶以来的皇室“少子”现象。明宪宗一朝，即便是在万贵妃迫害下，亦有10位皇子活至成年。但孝宗仅有一子活至成年，即武宗。武宗无嗣。兴王亦仅有一子活至成年，即世宗。同时，明代君主还受困于从宣宗开始的“早亡”问题：宣宗享寿35岁，英宗享寿36岁，宪宗享寿39岁，孝宗享寿35岁，武宗享寿29岁，

兴王享寿42岁。绝嗣和早亡的隐忧，是世宗除祈祷风调雨顺外的两大崇道动机。邵元节<sup>1</sup>获得世宗青睐的原因就是“雨雪愆期，祷有验”和“元节建醮……皇子叠生”，而陶仲文<sup>2</sup>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sup>3</sup>。

### （二）以“大礼议”为发端的改革与世宗君权的合法性补全

世宗之前的明朝历史上，只有一位小宗取代大宗的君主，即成祖<sup>4</sup>。由于成祖为太祖之子，永乐朝不存在明确新帝生父地位的问题。嘉靖朝则不然，世宗嗣位后，生父兴王的地位必须重新明确。杨廷和要求世宗仿效汉哀帝、宋英宗的做法，以孝宗为皇考、以兴王为皇叔考。世宗虽无法接受，但也一时无力驳斥。直到张璁横空出世，提出哀、英两帝系预立太子与世宗情况大不相同。并认为世宗依照遗诏和祖训“继续不继嗣”，完全没有必要变成孝宗的儿子。世宗遂扶植起以张璁为核心的新贵集团，与杨廷和集团彻底决裂。三年里，他成功将兴王尊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并通过迫使杨廷和致仕及实施左顺门廷杖掌握了朝廷绝对控制权。嘉靖三年（1524甲申）九月，世宗正式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将胜利结果落实为文本。

此后，世宗地将“大礼议”的变革之风延续、扩散。一方面，他依靠张璁等议礼新秀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一扫困扰明代前半叶的诸多积弊。备受史家称道的“一条鞭法”，亦自嘉靖九年开始试点。这些改革让朝政为之一振，正德朝濒临崩溃的王朝实现中兴，延续国祚140多年<sup>5</sup>。

另一方面，世宗通过国家祭礼——尤其是祭天礼仪的改革，实现了将已经称帝的生父称宗、祔庙，彻底补全了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明立国之初，分祀天地于南北郊，然而洪武十年，又改为合祀，太祖命以南

1 邵元节，字仲康，号雪崖，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入京，嘉靖五年（1526）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虔诚致一真人”，统领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明内府司礼监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细致刻画了邵元节在宫廷内举办道场的场景。参见《明史·列传一九五》卷三〇七，邵元节条，第78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2 陶仲文，一名典真，湖北黄冈人，初为乡吏，曾受法于罗田万玉山（名福敦）。参见《明史》卷三〇七，列传一九五，陶仲文条，第7896页，中华书局，1974年。李远国：《神霄雷法》，第119～1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明史》列传一九五《佞幸列传》。

4 对于世宗对于成祖的敬礼及仿效，参见 Richard G. Wang 王岗：“Qiyunshan as a Replica of Wudangshan and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Ming Empire,”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42.1 (2014): 42～45.

5 田澍：《嘉靖革新的历史定位》，《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0日。

郊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祭天时配仁祖（太祖生父）配<sup>1</sup>。嘉靖九年（1530 庚寅），世宗取缔大祀殿，重新分祀天地。嘉靖十七年（1538 戊戌），他依丰坊建议恢复明堂大享礼，依“严父配天”的周礼和大祀殿的配祀方法，使兴献帝得以配祀。之后，又将《孝经》中“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一句话逆推，上兴献帝庙号为睿宗，并将其升祔太庙，并举行了首次大享礼。但因为当时大享殿尚未完工，故于宫内的玄极宝殿行礼<sup>2</sup>。嘉靖二十四年（1545 乙巳），大享殿竣工，然世宗终其生从未亲赴祭祀，概因其时皇位合法性——“王”的身份构建已完美，其重心转移到道教信仰与实践——“神”的身份构建之上。因此，史学界通常将嘉靖十七年视为“大礼议”正式结束之年。

### （三）明世宗的道教信仰与“神王”概念产生

#### 1. 嘉靖以前的宫廷道教

明洪武十七年（1384 甲子），太祖将南京城内冶山永寿宫改建为朝天宫<sup>3</sup>〔图6〕，成为城中最大的道观，置道录司于内<sup>4</sup>，亦作为宫廷朝会前百官演礼之所<sup>5</sup>。他还设立神乐观，以道士负责朝廷坛庙的祭祀事务<sup>6</sup>。成祖北上，将南京既有的礼乐祭祀制度带到了北方，这也包括了负责祭祀的道士们<sup>7</sup>。作为南京的翻版，北京朝天宫在宣德七年（1432 壬子）开始修建<sup>8</sup>，它与成祖时已经修建的洪恩灵济宫<sup>9</sup>和大德显灵宫<sup>10</sup>，常被统称为“三宫”<sup>11</sup>。三宫的道士由太常寺给发钱粮以供生活<sup>12</sup>，他们平日在各



图6 南京朝天宫

庙中洒扫焚修，凡遇节庆及宫廷有需要时<sup>13</sup>，便云集一处共同举办道场，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清末。此外，又不乏京外的高道因皇帝信任而受召入京，直接参与宫廷道教斋醮活动者，如明世宗时的邵元节与陶仲文等。

#### 2. 世宗崇道三期及“神王”概念的提出

如前文所述，世宗受父亲影响自幼信道。杨启樵先生以嘉靖九年（1530 庚寅）之前作为世宗崇奉道教

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四，洪武十年八月，庚戌条。

2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六，乙亥条。

3 （明）葛寅亮：《金陵玄观志》，第1页，冶城山朝天宫条，南京出版社，2011年。

4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洪武十七年七月，建朝天宫条。

5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己未条：“重建朝天宫成……凡正旦、圣节、冬至群臣习朝贺礼于其中。”

6 佚名：《太常续考》卷七，第7页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成祖北上，神乐观三百名乐舞生道士与之同行，事见《太常续考》卷七，第8页上。又根据大德显灵宫住持周思德、东岳庙住持禹贵龔等亦随同成祖一同来京，故当时一同北上者，不只是神乐观之道士。

8 《明宣宗实录》卷九一，宣德七年六月：“命行在工部度地，建朝天宫于西直门内。”

9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六，永乐十五年三月，辛丑条：“建洪恩灵济宫于北京祀徐知证及其弟知谔。”

10 即上言之天将庙。

11 《明史》卷三〇七，邵元节条：“（邵元节）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第78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12 叶郭立诚：《北平东岳庙调查》，第9页，《民俗丛书》046，东方文化书局复刊，1971年。

13 凡三元日、五腊日、元旦、万寿节、冬至、皇子降生、皇帝驾崩、皇亲去世、祈晴、祈雨雪等情况下，都要在大高玄殿举办道场。



图7 御赐陶仲文银鍍金龙首丹匙

之首期<sup>1</sup>，以在宫内举行斋醮仪式为主<sup>2</sup>。这时的他与龙虎山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颢（1490～1551）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对张彦颢以师相称，并自称“元阳帝君”<sup>3</sup>。可见世宗此时已经有了超越普通君王的志向，而追求以神道治国的“神王”，一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sup>4</sup>。

嘉靖九年至十八年（1530～1539）是世宗崇奉道教的中期<sup>5</sup>。一方面因为世宗身体多病，他师从邵元节修学道家炼养之术<sup>6</sup>；另一方面因为乏嗣，令邵元节建醮祈嗣<sup>7</sup>。这已从单纯的祈福，逐渐发展到了个人提升的层面。

嘉靖十八年（1539己亥）世宗南巡老家安陆承天府，邵元节因年老将陶仲文推荐与世宗并得到宠信，以此为世宗奉玄的末期<sup>8</sup>。陶仲文精通道法的同时还深谙内丹炼养<sup>9</sup>及外丹烧炼<sup>10</sup>（图7），本文所探讨的明堂式道教建筑，都是在这一期营建的。

奉玄的末期恰遇壬寅宫变，世宗由紫禁城内至西苑万寿宫退居。此时，他从言行上，已是一个“亦帝亦道”的状态，宗教实践从祈求自身寿祉上升到为整个国家的福祚祈祷，他在西苑营建的一系列道观以及坛庙基本都指向于此。凡遇国有要事或者雨雪不调，他都要亲自参与祈祷<sup>11</sup>，而与此相对的他对于传统国家祭礼的长期缺席<sup>12</sup>。此外，世宗将一些战事胜利也归功于上玄大道的庇佑以及道士祈祷之功<sup>13</sup>。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

1 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第8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2 《明史》卷一九二，列传第八十，安磐条：“……帝频兴斋醮，磐又抗言……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旧辙。不斋则醮，月无虚日。”第5091页，中华书局，1974年。又《明史》卷二〇六，列传第九十四，张逵条：“嘉靖元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国是大定。今举动渐乖，弊端旋复。斋醮繁兴，爵赏无纪。”第5435页，中华书局，1974年。

3 《皇明恩命世录》卷八，收入《道藏》之续编《万历续道藏》，册29，第16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4 《宋史》卷二一，本纪第二一，第398页：“夏四月庚申，帝讽道箓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中华书局，1977年。

5 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第8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6 《明史》卷二〇九，列传第九十七，高金条：“……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恤，庶异端辟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终以其言直，释之。”第5517页，中华书局，1974年。

7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二，嘉靖十年十一月，癸酉条；卷一三四，嘉靖十一年正月，壬戌条。

8 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第8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9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第147页，大光明殿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 2012年永乐春拍，第651号拍品：明嘉靖御赐银鍍金龙首丹匙，匙柄背楷书阴刻铭文“钦赐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虽然很难说这件物品是专门用于为世宗烧丹所用，但至少从侧面证实了陶仲文精于烧炼丹药的事实。

11 《万历野获编》卷二，第48页，斋宫条：“他如洪应雷坛，上有祷必至；如凝道雷轩，上昼日常御……”中华书局，1959年。按《明世宗实录》中共记载有世宗在非传统儒礼坛庙亲祷雨雪的记录十条，分别为嘉靖二十年三月壬子于西宫、二十六年三月己卯于宫中、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于洪应雷宫、三十八年三月戊戌于雷宫、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于内殿、三十九年七月己巳于宫中、三十九年十一月己卯于雷宫、四十年十二月壬申于凝道雷轩、四十三年三月己未于洪应雷宫、四十四年四月丙戌于洪应坛。这些记录中所言的洪应雷宫与凝道雷轩皆位于西苑中。

12 《万历野获编》卷二，第50页，代祀条，中华书局，1959年。

13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二，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庚子条：“叛恶生擒，固义勇之徒奋刀，实鬼神默戮其魄，与流血千里者少差。且夏秋法雨消氛，故胡骑不得入而作奸……玄恩酬谢，礼不可无，别议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加少师，余如旧。”卷二九二，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午条：“以擒获逆贼王三等……今兹朕躬叩玄威神将效力，假手义勇故成擒耳……朕主神人不敢自尊其命官告谢朝天等六宫庙。”卷三九〇，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条：“上以逆鸾就戮，下诏称：秉一真人陶仲文叩玄伐虜之功，命岁加禄米百石，仍阴其子世昌为国子生。”卷三九二，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以岁终修谢典于内殿……传旨百官曰：朕钦承天祐，崇事玄修，今岁眷护非常，感恩莫报，凡尔内外诸臣宜尽一体大义，勿欺勿慢。”卷五〇九，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庚寅条：“……辽东饥疲之后有此克捷，乃数年所未见者，有功诸臣论赏宜重，上然之，仍以将吏用力归功上玄。”

六月，在给都察院的一封手谕中，世宗这样诠释自己的崇道行为，“朕承皇天宝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为”<sup>1</sup>。遍览史料，提出“神王二道裁理天下”的中国帝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图8〕。但“神王”亦非世宗原创，它托生于儒家的根本命题之一——“内圣外王”<sup>2</sup>。世宗的“神王”概念，是对“内圣外王”的一种独特诠释。

在嘉靖十八年（1539 乙亥），世宗与天师张彦颖的书信中改称自己为“象一帝君”<sup>3</sup>，这正好与同期开工大高玄殿内供奉他自己“玄修御容”的“象一宫”相对<sup>4</sup>。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 丙辰）他又为自己加上了三个圣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太上天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sup>5</sup>。圣号中的文字体现了他对于神圣力量的驾驭能力，世宗仿佛真地成为了他此前所诠释的“神王”。翌年落成的大光明殿则是这位神王在自己的道教神仙国土（西苑）内的明堂，他在这里祭祀道教天神——玉皇上帝。

### 3. 神霄雷法，“神王”的宗教实践

嘉靖十八年（1539 己亥）是世宗崇奉道教的分水岭，以此开始，陶仲文代替邵元节协助、指导世宗道教实践达十八年之久<sup>6</sup>，成为事奉世宗时间最长、对世宗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道士。在这一年，陶仲文随世宗南巡安陆承天府，因护驾有功被封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sup>7</sup>。次年（1540 庚子）四月，世宗为陶仲文在其家乡黄州敕建的雷坛开工<sup>8</sup>，而与此同时开工的大高玄殿建筑群中也存在着一座雷坛殿。陶仲文以“神霄”二字为封号，而“雷坛”则应是其行持雷法的坛场，这些似乎都暗示着他的雷法派背景。

大高玄殿落成一年后（1542 壬寅），陶仲文向世宗呈进了符秘合集《诸阶镇贴符》<sup>9</sup>一卷，其开篇所列的“斗姥镇国法宝”与时下江南正一道教使用的“元字符”的符法秘诀完全相同<sup>10</sup>，其法出自带有密教背景的神霄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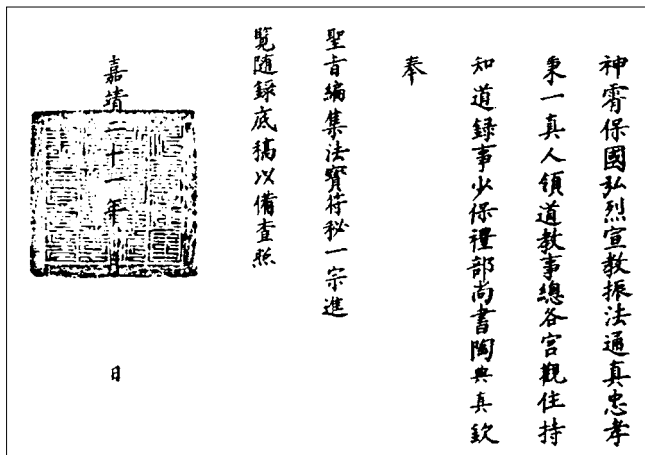


图8 《诸阶镇贴符》书影

1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三，嘉靖二十一年六月。

2 而这一命题的最早来源是道家经典《庄子》的“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3 《皇明恩命世录》卷八，收入《道藏》续编《万历续道藏》，册29，第16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4 刘若愚：《明官史》，第8页：“……曰象一宫，所供象一帝君，范金为之，高尺许，乃庙玄修之御容也。”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明史》卷三〇七，列传第一九五，陶仲文条，第7896页，中华书局，1974年。

6 《明史》卷三〇七，列传第一九五，陶仲文条，第7896页，中华书局，1974年。

7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二，嘉靖十八年三月，丙戌条：“以方士陶典真为‘霄保国宣教高士’，命吏礼二部给诰印……”

8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六，嘉靖十九年四月：“乘一真人陶典真奏建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雷坛……”

9 《藏外道书》册29，第150页，巴蜀书社，1994年。

10 陶金：《大高玄殿的道场与道士——管窥明清北京宫廷的道教活动》，第190页，刊载《故宫学刊》，故宫出版，2014年。

道书神霄派祖师王文卿（1087～1153）所传<sup>1</sup>《先天雷晶隐书》<sup>2</sup>，由此亦可见，陶仲文与神霄派雷法之关系。

神霄雷法作为道教众多道法中的一支，上接传统的五行学说及道家的元气说，以元气为本，五行之气为用，王文卿在他的《高上神霄玉枢斩勘五雷大法》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法理解释<sup>3</sup>。李远国曾论道：“（神霄雷法）认为人身为一小天地，而与宇宙大天地同一本体，同一运转规律，同一生成程序，从而将雷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模拟宇宙论的人体生命哲学之上。……在天人合一学说的基础上，人和天地的相互感应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sup>4</sup>而这正是世宗原创明堂式道教建筑的根本理论基础。

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 丙辰）世宗为自己所封的圣号中，“统雷元阳”、“总掌五雷”等用词中暗示了世宗对于雷法的认同与归属，尹翠琪还指出，“雷”字是世宗命名西苑道教建筑的主题之一，如雷霆洪应殿、轰雷轩、凝道雷轩、佑国康民雷殿、玄雷居等<sup>5</sup>。世宗甚至以这其中的“凝道雷轩”作为自己的别号<sup>6</sup>。通过世宗曾向陶仲文索取《诸阶镇贴符》省览一事不难看出，陶仲文正是世宗实践雷法修炼的导师，而大光明殿最北侧的帝师堂<sup>7</sup>应即是为陶仲文所设。

对于雷法的修炼与行持不但可以调养世宗多病的身体，还可以在理论上干预自然灾害，这正是世宗从“神王二道裁理天下”的角度出发，为整个国家的福祚祈祷所需要的。与雷法仪式所具备的精致方法论以及严密的操作程式相比，以乐舞、牺牲为祭祀方式的儒礼略显空洞单薄，这大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宁愿以“神王”的身份在西苑内为国家“亲祷”雨雪，也不愿前往圜丘或社稷坛以人君的身份举行祭祀。这里的“亲祷”不只是单纯的瞻礼，更是亲自登坛奉行雷法，夏言诗作“惊睹结幡劳使者，帝王道术万灵珍”<sup>8</sup>，“紫极宫中北斗坛，帝挥神剑夜星寒”<sup>9</sup>，“深宫秘祷民知否，世世长瞻万岁君”<sup>10</sup>，这些诗句正是世宗登坛的例证。

### 三 明堂式道教建筑，“神王”的宫殿

#### （一）世宗对于西苑仙境的营造

嘉靖三年（1524 甲申），邵元节自龙虎山入京，标志着世宗宫廷道教活动的正式启动。十四年（1525 乙酉）世宗将位于御花园中、供奉玄天上帝的钦安殿以围墙环绕，并设天一门<sup>11</sup>，使得这里成为一处合法举办斋醮道

1 《先天雷晶隐书》，收入《道法会元》卷八三，道藏第29册，第330b页。

2 陶金、张兴发：《江南道教正一派〈告斗科仪〉的道法初探——兼谈“斗姥奏告法”的形成》，收入《道教与星斗信仰》，第503～505页，齐鲁书社，2014年。

3 《道法会元》卷六一，收入《道藏》正乙部，册29，第16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4 李远国：《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第2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Maggie C. K. Wan 尹翠琪：“Building an Immortal Land: The Jiajing emperor's West Park,” *Asia Major* 3rd series, 22.2 (2009): 84～85.

6 《万历野获编》卷一，第30～31页，人主别号条：“又嘉靖二十三年，内廷施药于外，其药有‘凝道雷轩’之印，传闻‘雷轩’上道号也。”中华书局，1959年。

7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册2，第664页，大光明殿条，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8 《恭和御制吟二首》，收入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六，第40页。

9 《元日恭纪瑞雪诗五首》之三，同上。

10 《元日恭纪瑞雪诗五首》之三，同上。

11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〇，嘉靖十四年十月，丙午条：“上又以文祖建钦安殿祀真武之神，诏特增缭垣、作天一门，及大内左右诸宫并加修饰。至是皆告，上亲制祝文，告列圣于内殿，仍具皮弁服祭真武之神于钦安殿。”

场的殿堂<sup>1</sup>。然而,这一时期世宗尚致力于“大礼议”,其营造主要集中在宗庙祭祀方面<sup>2</sup>。嘉靖十八年(1539己亥)陶仲文的到来以及二十一年(1542壬寅)的壬寅宫变,促使他加速淡出宫城生活,其营造活动便转向了西苑仙境。

明代的西苑继承金、元两朝园囿,从一开始便以传统的一池三山形制来规划,以此呼应传说中仙人所居住海山三岛<sup>3</sup>。与紫禁城严谨的格局与建筑相比,西苑优美的风景更接近自然,自明初便被誉为仙境<sup>4</sup>。虽然西苑有着如此的海上仙岛的规划框架,但明初的帝王们还只是将它作为一处世俗的休憩场所,直到世宗时,才利用它的仙境母体将它营造成属于自己的“神王”国土。

由于前文所述小冰期灾害气候的影响,西苑内除仙阁楼馆外,一批用以祈祷农业丰收的坛庙、道观也被建立起来,如蚕坛、土谷坛、雩坛、大高玄殿雷坛、洪应雷坛、崇智殿等。其中,前三处坛为儒礼的举行场所,后几处则是道教斋醮场所,也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范畴。世宗将这些祭祀、祈祷性质的场所全部置入西苑,一方面应是从退居西内,参与仪式便利着想,另一方面则是想利用如此众多的带有神圣意义的场所,将他的西苑真正意义上变成一个独立的“神王”国土;恰如伊利亚德所说:“通过对他已经决定居住的世界承担的创造责任,他不仅完成了对混沌的宇宙化,而且他也通过对诸神世界的模仿,完成了对他的小宇宙的圣化。”<sup>5</sup>

## (二) 作为道教建筑的“坛”

在世宗原创“明堂式”道教建筑之前,道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道观布局体系,根据隋唐之际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sup>6</sup>记载,当时道观在主轴线上分别有山门、天尊殿、法堂三座主要建筑物。天尊殿前庭院以砖石建立露天的斋坛,作为举行最为重要的斋醮仪式的场所。按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云:“礼天地,通真灵,当建坛以伸至敬。”<sup>7</sup>这种“坛”多由土石堆砌而成,又依天地人之概念分为三层。《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云:“法天象地,像世威仪……凡坛壇之事,其制三级,盖分天尊地卑。”<sup>8</sup>坛的具体形制,因法派之不同大致分为两种。

1 最初的钦安殿可能只是单纯的玄天上帝供奉场所,而非非举行大规模宫廷斋醮的道场。明孝宗曾想在钦安殿外树立斋醮所用的幡杆,因工部尚书认为“非祖宗旧制,且宫禁内不宜用此”。而作罢。嘉靖十四年,世宗在名义上将坤宁门从钦安殿北南移至今天的位置,使得钦安殿变成了后宫以外的区域,又将钦安殿以围墙与外界隔离,从而使钦安殿成为后宫之外相对独立的宗教活动区,为在其中举行斋醮做了充足的准备。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三九,弘治十一年七月,壬子条。王子林先生曾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参见《紫禁城原状与原创》上册,第17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2 世宗早期于宫内的营建基本全系为其生父所建造的祠庙:嘉靖三年为兴献王建观德殿于奉先殿西、四年建世庙于太庙东、六年移建观德殿于奉先殿东,改名崇先殿、十四年建九庙、十五年建献帝庙于太庙东南。参见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第138~139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3 朱契:《元大都宫殿图考》。朱启铃:《元大都宫苑图考》。

4 参见尹翠琪:《西苑洞天:嘉靖御用瓷器的道教纹饰》,收入《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第43~4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第3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

6 金明七真:《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四,收入《道藏》太平部,册32,第744~74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7 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三一,收入《道藏》正乙部,册30,第93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8 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收入《道藏》洞真部方法类,册4,第1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图9 茅山元符万宁宫万寿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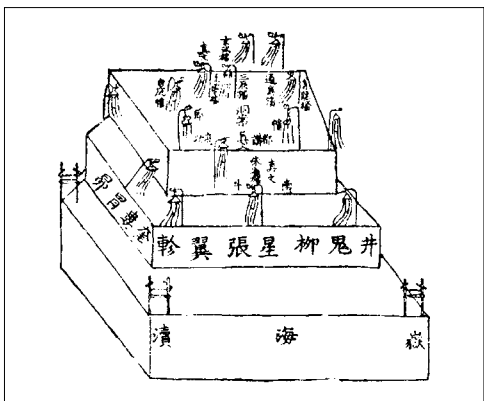


图10 宋代《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所录斋坛图



图11 青羊宫八卦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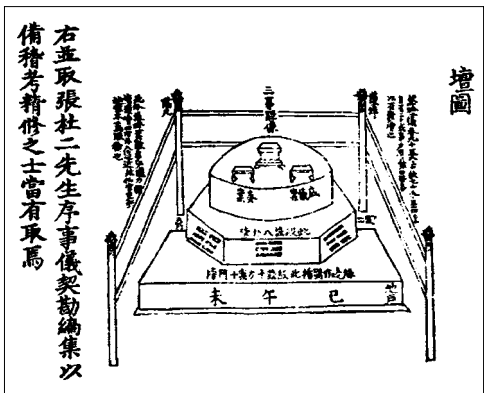


图12 《道门定制》所录斋坛图

### 1. 三级方坛

江南茅山的元符万宁宫始创于北宋徽宗时期<sup>1</sup>，其明代石质的万寿台（斋坛）〔图9〕平面呈正方形，三级，东南角巽位与西北角乾位设石阶，基本符合宋代主流灵宝斋法典籍中对于虚皇坛的记录<sup>2</sup>。〔图10〕

### 2. 上圆下方坛

四川成都青羊宫为蜀中巨观，唐代僖宗时曾得到大修<sup>3</sup>，现存中轴线上的八卦亭位于三清殿正前方，重檐八角攒尖顶，石座共分三级，下层正方形，中层八边形，上层圆形。据观中老道长介绍<sup>4</sup>，八卦亭石座原为一座石坛，同、光年间<sup>5</sup>建亭之前，于坛上举行祈雨等法事。〔图11〕据宋代吕元素《道门定制》记载，这种上圆下方的斋坛形制出自唐代高道张万福与杜光庭<sup>6</sup>〔图12〕。元代浙江大涤山上顶曾有一座规制相同的法象坛，“上应天而圆，下应地而方，中应易卦而八角”<sup>7</sup>。由此可见，这种形制亦是对于外部宇宙秩序的一个微观模型。

张泽洪认为，道教的斋坛制度实际承袭了先秦祭坛之法<sup>8</sup>。《道门定制》也说：“一如朝廷圆丘之仪，此方见古意也。”<sup>9</sup>不论是正方形的虚皇坛，还是上圆下方的法象坛，他们所表达的“法天象地”的概念是一样的：道士旋绕登坛，奉行斋醮，以此与二仪、三才、四象、五行相感合，由此达到天人合一并与神明进行沟通，这与明堂的宗教含义完全一致，都是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具象模型，以及天人合一的重要媒介。

1 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七，楼观部，收入《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册5，第624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三一，收入《道藏》正乙部，册30，第940～941页；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一七，收入《道藏》正乙部，册31，第438页；林灵真：《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一，收入《道藏》洞玄部威仪类，册7，第2页；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六，收入《道藏》洞真部方法类，册4，第11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3 张元和：《青羊宫建置源流》，《中国道教协会会刊》1986年第19期。

4 原青羊宫道士董至光转述。

5 张元和：《青羊宫建置源流》，《中国道教协会会刊》1986年第19期。

6 《道门定制》卷八，收入《道藏》正乙部，册31，第739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7 《大涤洞天记》卷上，收入《道藏》洞神部谱录类，册18，第150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8 张泽洪：《论道教斋醮礼仪的祭坛》，《中国道教》2001年第2期。

9 《道门定制》卷八，收入《道藏》正乙部，册31，第739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 （三）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实践过程

由于档案的缺失，我们无法确凿地认定世宗曾亲手设计规划了西苑以及这些道教建筑，但通过他对于北京的宫禁、园囿、坛庙所进行的一系列改扩建工程乃至嘉靖时期官窑御用瓷器的烧造来看<sup>1</sup>，他的确是一名热衷于创意设计的道教信徒，且具有一定水平的审美。参照清代雍乾二帝指导宫殿、文玩等物品制作的上谕我们可以推测，西苑乃至这一系列明堂式道教建筑，也必定是由世宗一手设计规划的。带着这样的一种思路，我们以“神王”、建筑师的多重身份来探索世宗的明堂式道教建筑，可以看出他的这些作品的设计手法也同大多数建筑师一样，经历了前期的探索、初步尝试并最终达到熟稔；它们不仅是宗教建筑，更是世宗“神王”追求的物化表现。虽然明代宫廷中一直存在着类似明堂式的圆形攒尖顶建筑，如前朝三大殿之一的华盖殿以及苑囿中的其他一些亭台，但它们因为并未赋予明堂概念以及道教祭祀功能，因此不在此列。

#### 1. 前期探索阶段

##### （1）万春、千秋二亭

嘉靖十四年（1525 乙酉）世宗围绕钦安殿对紫禁城后苑（神武门内御花园）进行了大手笔改动<sup>2</sup>，这包括万春、千秋二亭的建设<sup>3</sup>。此二亭左右对称，造型一致，皆为大式作法重檐亭，上檐圆形攒尖顶，下檐正方，四面各出庑殿顶抱厦一间〔图 13〕，呈“亚”字形平面，与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明堂形制十分类似<sup>4</sup>。〔图 14〕

从后苑建筑整体布局关系来看，它们南北向分别与浮碧、澄瑞亭二亭同一轴线，东西向则位于钦安殿两侧稍南的位置，呈胁侍钦安殿之势〔图 15〕。这种殿前二亭式的布局可见于《金后土庙像图》<sup>5</sup>（金天会十五年 1137 丁巳）以及稍晚的《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sup>6</sup>（金承安五年 1200 庚申）〔图 16〕的图像中。在这两幅图像中，大殿前庭院正中的露台亦作为仪式所用的坛场，两侧亭子中空，当为辅助性的仪式建筑。



图 13 故宫御花园万春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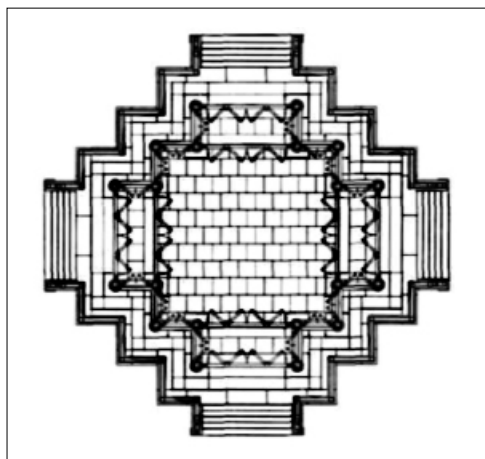


图 14 万春亭平面图

1 参见尹翠琪：《西苑洞天：嘉靖御用瓷器的道教纹饰》，收入《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第 43～44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年。

2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〇，嘉靖十四年十月，丙午条：“上又以文祖建钦安殿祀真武之神，诏特增缭垣、作天一门，及大内左右诸宫并加修饰。至是皆告，上亲制祝文，告列圣于内殿，仍具皮弁服祭真武之神于钦安殿。”

3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第 55 页：“万春亭牌、千秋亭牌。已上两亭，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添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

4 根据前引考古发掘与复原，西安的西汉明堂、洛阳的武周明堂，皆为“亚”字形平面布局。

5 位于山西万荣县后土庙内，金天会十五年立，正面线刻汾阴后土庙全貌图，背后刻《历朝立庙致祠实迹》文。参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下册，第 45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6 位于河南嵩山中岳庙内，金承安五年立，正面刻中岳庙全貌图。参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下册，第 40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现藏于河南省登封县中岳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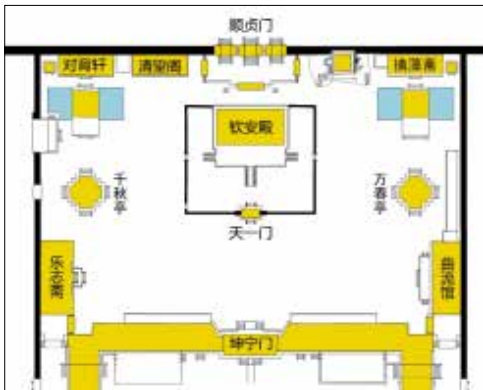


图 15 万春亭、千秋亭与钦安殿位置关系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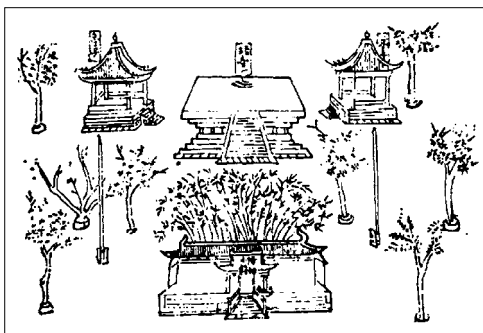


图 16 《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殿前庭院内的建筑



图 17 宫右乾隅的玄极宝殿

万春、千秋二亭用材较大，抱厦门内又安以重门，类似的建筑形制及布局还见于大高玄殿门口的音乐亭。由此推测，此二亭在创建伊始应是钦安殿举行大型道场时的辅助性的音乐亭<sup>1</sup>。更为重要的是，世宗将它们以“亚”字形明堂式样建造，其目的很有可能是为稍后在宫中建立一座小明堂做建筑风格与技术上的准备。

## (2) 玄极宝殿

世宗从嘉靖六年（1527 丁亥）便有了建立明堂的兴趣<sup>2</sup>，但直到十七年（1538 戊戌）六月他才以“宫右乾隅”的玄极宝殿作为明堂，举行了大享礼<sup>3</sup>。据王子林先生研究，玄极宝殿即今中正殿之香云亭，其始建年代已难考证，但就目前所复原的建筑形式来看，与万春、千秋二亭几无差别〔图 17〕；再者它们的修建时间与玄极宝殿举行大享礼仅相隔三年，且当时“大内左右诸宫并加修飭”<sup>4</sup>，故推测玄极宝殿的始建时间应当也是在嘉靖十四年左右。

虽然玄极宝殿是明堂大享礼的举行场所，但就整体一组建筑群来说，它的最初面貌应是一座宫廷道观，这首先体现在“玄极”、“凌霄”、“集真”这些带有道教意趣的门殿匾额上；其次，虽然隆庆元年（1567 丁卯）玄极宝殿内的大享礼被停止<sup>5</sup>，但据刘若愚记录，殿内的道教活动似乎一直在延续<sup>6</sup>，直到崇祯五年九月<sup>7</sup>。故而所谓玄极宝殿其实是类似大高玄殿的一组建筑群，儒家祭礼与道教斋醮在不同的殿堂内被举行。

从万春、千秋二亭开始，世宗开始了颇为小心谨慎的明堂式建筑形式探索，他先以这两座无关紧要的亭子作为试验（但仍然具有仪式性功用），进而将它利用于作为宫内小明堂的玄

1 清代曾以万春、千秋二亭供奉关帝等神。

2 《明世宗实录》卷七六，嘉靖六年五月：“上问辅臣曰：‘昨闻讲《大学衍义》中论汉明帝三雍，解曰：一曰明堂、二曰灵台、三曰辟雍。朕观历代皆有明堂，未审我祖宗朝即明堂否也？’”

3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六，嘉靖十七年九月，辛卯条：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

4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〇，嘉靖十四年十月，丙午条：上又以文祖建钦安殿祀真武之神，诏特增缭垣、作天一门，及大内左右诸宫并加修飭。至是皆告，上亲制祝文，告列圣于内殿，仍具皮弁服祭真武之神于钦安殿。

5 《明穆宗实录》卷二，隆庆元年正月上。

6 刘若愚：《明官史》，第 54 页：“道经厂，演习元教诸品经杆。凡建醮做好事，亦于隆德、钦安等殿张挂幡榜，穿羽流服色。而云歌清雅，俨若仙音。”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7 刘若愚：《明官史》，第 16 页：“其雨幡竿插云向南建者，隆德殿也。旧名立极宝殿，隆庆元年改今名，供安三清上帝诸尊神。”万历四十四年冬被灾，天启七年三月修盖，崇祯五年九月内将诸像移送朝天等宫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极宝殿，这使得大享礼能够在得到廷臣确立的第一时间内举行，并为他稍后建造天坛大享殿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 2. 初步尝试阶段

玄极宝殿大享礼之后的第二年（十八年 1539 己亥）天坛皇穹宇<sup>1</sup>开始动工，这也是一座明堂式建筑，但作为工程主角的大享殿则一直到二十二年（1543 癸卯）才开工，二十四年（1543 癸卯）落成。天坛大享殿作为明世宗的明堂，成功地达到了将其生父配享上帝的目的，以此配合睿宗的祔庙，使大礼议最终成功。但是对于世宗来说，国家祭祀的改革只是政治博弈的工具，而非个人终极信仰，大享殿落成后，他本人从未亲赴现场举行过祭祀。



图 18 大高玄殿无上阁（今乾元阁）

因为大享殿没有布政与教育的功能，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明堂，世宗因此不再被历史上诸儒的辩论所困扰，去繁就简，设计出了纯净的三重檐圆攒尖顶建筑。此后，他秉承这一简约化的设计心得，投入到了构建西苑仙境的道教建筑的设计中，类似玄极宝殿的“亚”字形平面布局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 （1）大高玄殿乾元阁

大高玄殿是世宗在宫城内新建的第一座宗教建筑，与皇穹宇几乎同时开工<sup>2</sup>，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壬寅）四月完工<sup>3</sup>。这座道观在世宗所建的所有道观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一是因为它的主殿大高玄殿内供奉着代表大道的道教最高神——三清三境天尊，二是因为其中建有供奉世宗玄修御容的象一宫<sup>4</sup>。大高玄殿的主体建筑自南向北分别为两道琉璃门、大高玄门、大高玄殿、九天应元雷坛、乾元阁。其中大高玄殿供奉孕育化生宇宙的三清三境天尊，属于传统道观的主殿规制，也是大型斋醮道场的场所，具有极强的普世性质。九天应元雷坛供奉神霄派主法神——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应是专为陶仲文所设行持雷法祈祷雨雪的坛所，具有鲜明的教派性质<sup>5</sup>。最后一进无上阁，清代改称“乾元阁”，上层圆形攒尖顶，下层方殿名曰坤贞宇，是十分典型的明堂式建筑<sup>6</sup>，是世宗宇宙观的表达，属于皇帝的个人信仰层面〔图 18〕。这三座建筑依次由南向北排列，体量也随之减小，其所呼应的主题也从宏观的宇宙、教派过渡到“神王”个人<sup>7</sup>。

乾元阁的建筑体量虽然不大，但却十分特别：首先，它在建筑群中所处的最后位置是宋以后道观中玉皇

1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八，嘉靖十八年八月，甲申条：“以恭制皇天王册、祖考宝册及祗建皇穹宇兴工，躬奏告上帝于南郊泰神殿。”

2 《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八，嘉靖十九年六月：“上曰：‘各财用军匠事宜俱依拟，惟西苑仁寿宫宜同钦定殿并力速成，余暂停止……’钦定殿工程重大，总督文武大臣宜遵昭皇穹宇日期督视。”按钦定殿即大高玄殿，参见杨新成：《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又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八，嘉靖十八年八月，甲申条：“以恭制皇天王册、祖考宝册及祗建皇穹宇兴工躬奏告上帝于南郊。”由此可推测大高玄殿之兴工时期约同于此。

3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〇，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庚申条。

4 《万历野获编》卷二，第48～49页，斋宫条：“他如洪应雷坛，上有祷必至；如凝道雷轩，上昼日常御……”中华书局，1959年。

5 张国桢：《大高玄殿》，转引自杨新成：《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2期。

6 由王世仁先生复原的大同北魏明堂与乾元阁的建筑形制十分相似。

7 参见陶金：《大高玄殿的道场与道士——管窥明清北京宫廷的道教活动》，第191页，《故宫学刊》2014年。



图 19 无上阁上层供奉玉皇的神龛



图 20 蕉园崇智殿及太玄亭（今万善殿、千圣殿）

阁经常出现的位置<sup>1</sup>，乾元阁虽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在上层供奉玉皇，但它底层所供奉的后土皇地祇实际与上层的玉皇一起〔图 19〕，复原了政和六年（1116 丙申）年宋徽宗所建构的玉皇—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的神系框架起来。宋徽宗以此将祭祀天地的合法性分享给了道教，并因为能以道教化的方式祭天，使得其道君皇帝的身份进一步完善。乾元阁隔壁的象一宫内，供奉着世宗作为象一帝君铜像，由此看来，世宗所建的乾元阁不只是单纯的玉皇阁，更像是一个被道教化的明堂，而其真正用意是将自己塑造为一名“神王”。

大高玄殿乾元阁是世宗所建造的第一座明堂式道教建筑，他巧妙地利用了传统道观玉皇阁的位置，将他心目中道教化的明堂低调地摆放进去。毕竟这才是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初次尝试<sup>2</sup>，他不会在一开始就让这种新奇的道教建筑形式设定为主体建筑，进而引起不必要的议论，这种迂回行事的策略正是他在大礼仪中所运用的。

## （2）蕉园崇智殿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壬寅）大高玄殿刚完工后的第二个月，世宗便又投入到崇智殿<sup>3</sup>的工程中。崇智殿又称五雷殿，位于中海蕉园<sup>4</sup>，清代更名万善殿以事佛，建筑形制基本未变，殿前有“宫眷法从人等至此下马”石碑两通<sup>5</sup>，与大高玄殿类似<sup>6</sup>，大学士高士奇以此认定它是明世宗的斋醮坛场之一。

崇智殿为重檐歇山顶方殿式建筑，根据民国时期照片分析，其后有一穿堂与北部重檐圆殿相接〔图 20〕。在《酌中志》、《春明梦余录》的记载中，崇智殿乃是一组建筑的名称，有五雷殿、左迎祥馆、右集瑞馆、太玄亭、问法所、临漪亭及水云榭等建筑。其中五雷殿当即是方殿，左迎祥馆、右集瑞馆为东西配房，水云榭为水中岛榭，其余的问法所、临漪亭之名都无法与圆殿所处的重要位置相配，故推论圆殿即太玄亭，此猜想亦与单士元先生所作《五雷殿及临漪亭图》<sup>7</sup>吻合。清代圆殿易为千圣殿，内奉紫檀佛塔一座，建筑形制沿

1 明代南、北二京的朝天宫皆以玉皇阁作为北端的后靠建筑，全真道兴起后亦将三清殿作为主殿，玉皇阁位居其后。

2 北京延庆县玉皇阁、河南开封延庆观玉皇阁、湖北荆州玄妙观玉皇阁、贵州威宁县玉皇阁、贵州凤岗土溪镇玉皇阁、云南大理弥渡回龙寺玉皇阁、云南大理天峰山玉皇阁等均为攒尖顶式建筑，但因其并未具备圆顶的建筑形式以及同时供奉玉皇与后土故不能称之为道教化的明堂。

3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第 88 页：“五雷殿牌、左迎祥馆、右集瑞馆、太玄亭扁、问法所、临漪亭牌、水云榭牌。已上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添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

4 参见姜舜源：《中海万善殿史迹考》，《紫禁城》1988 年第 1 期。

5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第 125 页，芭蕉园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6 刘若愚：《明宫史》。大高玄殿前竖石碑，牌曰“宫眷人等至此俱下车马”。世宗尊崇玄教，敬恪如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7 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 49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袭至今未变。

在大高玄殿乾元阁的个案中，象征天的圆顶被纵向地置于象征地的方殿之上，而崇智殿这里，也许是由于当时所供奉的神明体系与乾元阁不同，原有的纵向组合被易以横向组合：圆殿置于北而方殿置于南，穿堂的连接，使天地一体的概念仍然存在。此时的世宗，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建筑师，正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一套他从传统明堂建筑中提取出来的建筑构成方式加以演绎与尝试，从乾元阁到崇智殿建筑单体布局的变化，体现出了世宗对于创意设计的热爱。

### 3. 整体规划阶段

世宗在大高玄殿乾元阁与崇智殿两个建筑案例中，主要是在建筑单体上对圆与方体块的结合进行演绎与尝试，在稍后的规划中，他将此种形式放大到建筑群整体布局的设计中，将明堂式建筑的概念进一步扩大。

#### (1) 雷霆洪应殿

落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5 乙巳）四月的雷霆洪应殿<sup>1</sup>是一组比较特殊的建筑，因其拆除时间较早<sup>2</sup>，故而所知信息极为有限，单士元先生经过缜密的考据论定其位于万寿宫之东、紫光阁之南的位置<sup>3</sup>，与崇智殿隔海相望。

《万历野获编》所云“洪应雷坛，上有祷必至”<sup>4</sup>，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来看，这里是世宗专门举行每年春祈大典（祈年醮）、秋报大典（报丰醮）以及应时性祈雨、祷雪的场所，其中春祈大典 11 次、秋报大典 11 次、祈祷雨雪 9 次。从这些旨在祈祷农业生产的仪式来推测，雷霆洪应殿即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 壬寅）开始兴建的佑国康民雷殿<sup>5</sup>，也便是与乾元阁、崇智殿同一时期的建筑工程，那么世宗在崇智殿所尝试的明堂式建筑形式也极有可能应用在此处，但可惜除匾额名称外建筑遗存与图纸均不可得，所幸单士元先生多方汇集史料，绘成《太液池西雷坛图》<sup>6</sup>。〔图 21〕在单老图中，主体建筑雷坛与其他附属建筑呈中心对称式平面布局关系，这实际便是将明堂式建筑的单体形式进一步上升到建筑群体布局的层面。此外，附属建筑中有五座皆以“室”来命名<sup>7</sup>，四座以“堂”来命名<sup>8</sup>，这必然是对明堂五室四堂<sup>9</sup>这一概念的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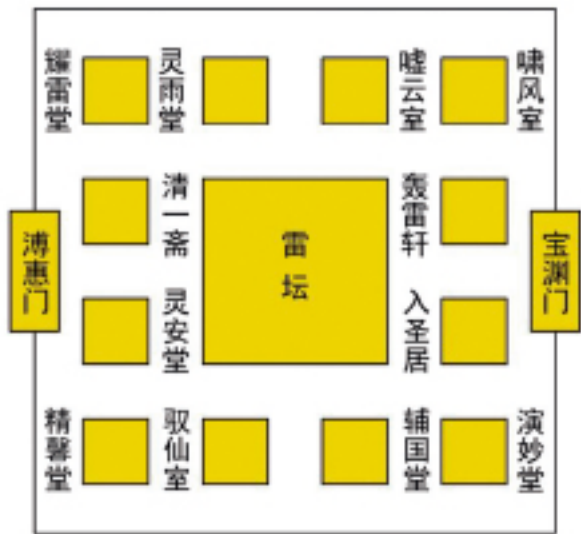


图 21 单士元先生绘《太液池西雷坛图》笔者重摹

1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丙戌条：“新作雷霆洪应殿成，建坛祀六日。”

2 《万历野获编》卷二，第 48 页，斋宫条，中华书局，1959 年。

3 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 39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4 《万历野获编》卷二，第 48 页，斋宫条：“他如洪应雷坛，上有祷必至；如凝道雷轩，上昼日常御……”中华书局，1959 年。

5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六，嘉靖二十一年九月，癸亥条：“新作佑国康民雷殿……刘魁因奏：顷者营建泰享殿、大高玄殿等工尚未告成，今复有雷殿之役，财力无从措办。宜且并工庙建，以宽民力。疏入，上怒其阻挠欺慢，命锦衣卫执而杖之，仍锢于诏狱。”

6 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 47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7 啸风室、嘘云室、灵雨室、耀雷堂、灵安室，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 47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8 精馨堂、取仙堂、辅国堂、演妙堂，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 47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9 参见《吕氏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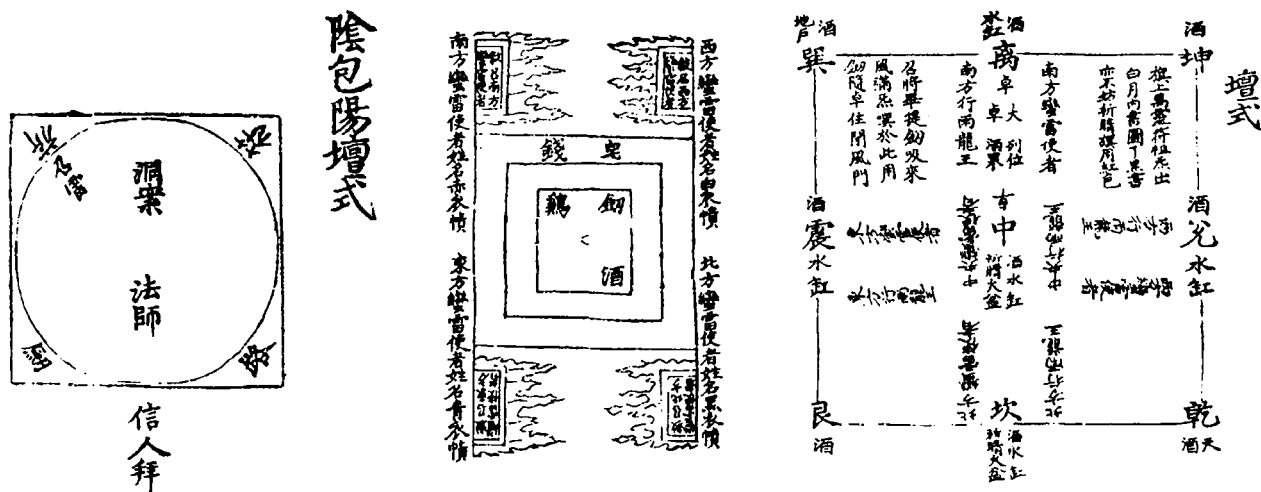


图 22 《道法会元》所收录之不同法派雷坛图

雷坛不同于供奉玉皇与后土的乾元阁，是供奉雷部诸神与行持雷法的道场。在诸多雷法派别中，陶仲文所行的神霄雷法以祈晴祷雨见常，并最为讲究筑坛行法<sup>1</sup>，据《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枢灵文》所引神霄派祖师火师汪真人云：

若国土、州邑雨降连月，江河泛涨……国君，守土长官，欲祈晴明，速退雨水，须申五雷使院，雷霆三司，并奏上帝，具述词旨……二日不应，第三须择高山或无水处，用黄泥土作坛三层，阔如祈雨坛式。但每层只高一尺二寸。筑坛毕，上层置香案，供养负风猛神风伯大神欵火大神，在两边中供养四司主者<sup>2</sup>。

可见，雷坛的形制与传统意义上的祭坛并无太大差别，细微的差别大概体现在：1. 所供奉的神灵以雷部祖师、神将为主；2. 雷坛上常常需要设置七星旗、法剑与祭雷神的雄鸡与酒。可见，雷坛的形制并不仅仅是照搬上古的祭坛或中古时期道教的斋坛，而是有其自己的观念表述。虽然不同法派的雷坛规制不尽相同，但其归根结底所反映的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sup>3</sup> [图 22]。

总而言之，不论是雷法的宇宙观理念，还是雷坛的建筑形式，都能与明堂高度契合，明世宗敏锐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并创造性地将雷坛与明堂式建筑形式相关联，并重新设计表达出来。对于雷坛的“明堂化”，还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合法性的赋予，同时也暗示世宗作为“神王”，掌控雷霆力量，并可依此“裁判天下”。

1 《道法会元》中刊载有雷坛图式的道法有：卷五十六《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枢灵文》、卷八六《先天雷景隐书》、卷一一三《帝令宝珠五雷祈祷大法》、卷一四七《洞玄玉枢雷霆大法》、卷一九八《神霄金火丁大法》。依据这些文本中的道法内容（咒、符、罡、诀、气法等），它们无一例外皆隶属于大的神霄雷法系统之内。其余的清微、酆岳法派祈晴雨阳的道法内容比重相对较少，更少雷坛图式的记录。

2 《道法会元》卷五六，收入《道藏》正乙部，册 29，第 144 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3 《道法会元》卷一四七，收入《道藏》正乙部，册 29，第 765 页；《道法会元》卷五六，收入《道藏》正乙部，册 29，第 147 页；《道法会元》卷八六，收入《道藏》正乙部，册 29，第 357 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2) 大光明殿

嘉靖三十五年（1556 丙辰）世宗为自己新加三个圣号：“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太上天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sup>1</sup>。这个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了世宗对自己的道教“神王”的定位，这位“神王”以西苑作为自己的国土，以万寿宫作为自己的宫阙，但为了使“神王”身份更为完善，他还需要一座道教化的明堂。这座明堂内理所当然供奉的是玉皇上帝。第二年（1557 丁卯），作为道教明堂的大光明殿完工，它紧邻万寿宫西侧，是当时西苑内最大规模的宗教建筑群。

虽然大光明殿已经在庚子之乱中被焚毁，但清末已经引进的摄影技术仍可以使我了解到它的建筑形制以及建筑群布局〔图 23〕。主殿大光明殿，重檐圆攒尖顶，下有二级圆形汉白玉石座，完全是天坛大享殿的缩小版；世宗别有用心地让它的建筑级别低于大享殿的三层檐、三层石座，应是为了避免引起廷臣们非议。在主殿的四角，是四座围绕中心对称布局的重檐方亭，它们坐落于高台上，应当也是辅助性仪式功能，也就是音乐亭〔图 24〕。由四座方亭再往外扩延，高大的回廊围合出一个严整的平面正方形的院落，其东、西为太始、太初二殿，南北为玉宫、永吉二门，也皆为中心对称之势。由此，我们似乎看到曾在雷霆洪应殿所使用的明堂式院落布局在这里被演绎得更加熟稔，“实”的圆形殿堂，与“虚”的院落不仅巧妙地呼应了明堂的主题，而且又突出了“天”在这里的重要性，四座方亭以及门殿更将中心对称关系加以确认，从而使这一院落的平面达到了方与圆、虚与实之间的完美平衡。与雷霆洪应殿纯粹明堂式平面布局不同，大光明殿建筑群通过在南、北设门的方式将其与传统的轴线式布局结合起来：穿过北侧永吉门后，建筑空间从原本的中心对称式院落变为东西对称式，太极殿作为传统道观中的主殿供奉三清，其后依照惯例建高阁，最后的帝师堂等与传统道观布局中方丈、监院居后的习惯吻合。总而言之，在大光明殿的个案中，世宗创造性地将两种布局形式相结合，如此既满足了它作为明堂单独掌控一区的需要，又将其与传统的轴线布局结合，满足举行斋醮的需求。

与雷霆洪应殿相比，大光明殿内所举行的宗教活动更倾向于“神王”个人，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 丁卯）



图 23 清末大光明殿旧影



图 24 清末大光明殿角亭之一

<sup>1</sup> 《明史》卷三〇七，列传第一九五，陶仲文条，第 7896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十一月大光明殿落成时，便举行了为皇帝延寿的“景命修报”，所谓“景命日”<sup>1</sup>即是指皇帝的“本命日”<sup>2</sup>；三十七年（1558 戊辰）七月，大光明殿又举行了一次七日的“景祝大典”应当也是。此外，《烬宫遗录》中记载：

光明殿供安玉帝像，正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并到殿行香，其朝礼之词每自称儿子<sup>3</sup>。

正月初九日为玉皇圣诞，而十二月二十五日则为所谓玉皇下界勘察巡视之日。世宗在玉皇面前自称儿子，恰恰是丰坊在奏疏中所言“古者圣王以为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义尊而情亲”<sup>4</sup>。由此可见，世宗的的确确将大光明殿视作自己作为“神王”的明堂，他的这种身份因在这里所举行的祭祀而得到完善。

#### 4. 几座疑似明堂式道教建筑

除了以上七座建筑以外，现存御花园中的四神祠<sup>5</sup>、北海团城乾光殿<sup>6</sup>、已毁的万寿宫太玄亭<sup>7</sup>、万法宝殿天地亭<sup>8</sup>等建筑虽然不具备核心的宗教功能，但都有着一定宗教使用意图，并具备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形式意向，笔者将其列为疑似明堂式道教建筑。

### 结语 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多重内涵

嘉靖十七年“大礼仪”结束之前所营造的明堂式道教建筑，带着前期探索的性质，万春、千秋二亭以及玄极宝殿，都忠实地再现了历史上明堂的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式以及“亞”字形的平面布局。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世宗开始了真正的明堂式道教殿堂的营造，大高玄殿乾元阁作为其中的第一座，上圆下方，上玉皇后土的规制带有明确的明堂意趣，但与之前的试验性建筑比起来，形体更为简洁。稍后的崇智殿为北圆南方式平面布局，我们似乎看到，作为建筑师的世宗在尝试着更多方、圆体块组合的可能性。从雷霆洪应殿开始，世宗将中心对称的明堂式布局从建筑单体提升到了建筑群布局的层面，最终，世宗将这种布局在大光明殿的案例中与传统的轴线式布局相对接，完美地调和了建筑的象征性与实用性〔图 25〕。

- 1 《明世宗实录》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礼部覆该监议谓二月丁卯乃景命之月理当忌避；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乙丑条：以大道殿新成，建景命吉典，停封九日；卷五一〇，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乙卯条：谕礼部自今凡遇景命日前后停封事九日以为常诸临期降谕不在此限。
- 2 所谓本命日，即与出生日天干、地支相同的日子，道教有再本命日修斋诵经祈福诞生的传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云：本命之日，诵咏是经，魂神澄正，万气长存。不经苦恼，身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万神朝礼，名书上天，功满德就，飞升上清。《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册1，第3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 3 转引自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23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 4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三，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条。
- 5 位于后苑钦安殿外西南角，单檐八角攒尖顶，前出卷棚歇山抱厦。落成于嘉靖十五年（1536 丙申），当与天一门、万春亭、千秋亭同为一期工程。四神祠的八角攒尖顶虽然不能够算严格意义上的明堂式建筑，但其四神之数目与八角形的建筑形式相呼应，亦属于中心对称式平面。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第5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 6 即今北海团城承光殿，嘉靖三十一年（1552 壬子）定名乾光，嘉靖三十三年（1554 甲寅）“建醮于乾光殿景祝坛十日”。据刘若愚介绍，乾光殿的形制为一圆殿这可能与其所在的圆形团城有一形式上的呼应。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第7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明世宗实录》卷四一〇，嘉靖三十三年五月，甲子条。
- 7 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4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 8 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收入《单士元集》第一卷，第5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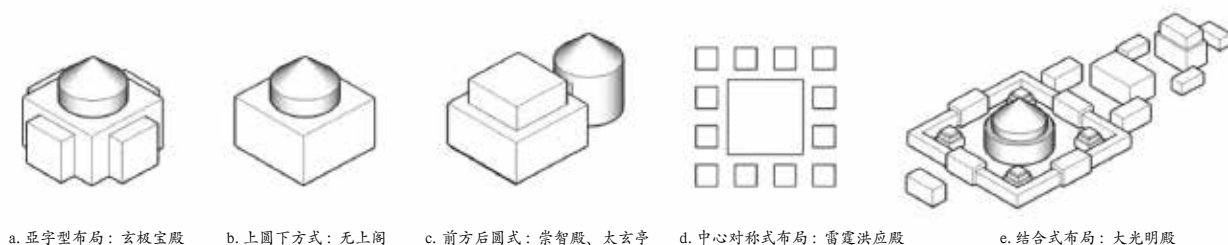


图 25 明世宗明堂式道教建筑设计手法之变化

明堂式道教建筑的创立与世宗的政治、宗教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同步性。嘉靖十七年之前的大礼议时期，世宗的营造工作以儒礼建筑为主，其中复活明堂的最初目的是通过祭天以及与祭天相关的概念来提升自身皇位合法性，宫右乾隅的玄极宝殿是营造天坛大享殿的先行，也在此时开始营造，并在嘉靖十七年的大享礼中正式投入使用。

嘉靖十八年，大礼议尘埃已定，世宗作为人君的合法性已足，便将精力转入个人的宗教实践以及神王身份的完善上。他进而退居西苑，开始通过加建仙宫道观以及坛庙来使这里更加具备神圣性。明堂形制被用于道教建筑，国家祭典的荣耀与合法性被转移给道教祭祀。伴随着这一转移，明世宗完成了从一个苦苦争取尊严与地位的少年君主到拥有华丽尊号的“神王”的蜕变。遍布宫禁内外的明堂式道教建筑，成为世宗“神王二道裁理天下”的新舞台。嘉靖三十六年，道教明堂大光明殿落成，对世宗而言，只有在这座道教明堂里主持对于玉皇上帝的祭礼，才能使他的“神王”身份最终得到完善。

远儒士近道士、弃朝政迷玄修，是明世宗在当时和后世遭到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但客观来看，执政方面，世宗辍朝而不懒政，他驾崩后的明帝国远比其即位前强盛与稳定；价值观方面，世宗看似将道教地位抬升到儒家之上，而事实上却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改造了道教。继宋代真、徽二宗后，再一次强化了对代表至上皇权的玉皇大帝的崇拜，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道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世宗身后被污名化，明堂式道教建筑亦多被弃用和湮没，但这种以周礼为来源、以道教斋醮为功用、以理学价值观为潜台词创造的建筑形制却直接影响了清代世、高二宗的宫廷教建筑营造，甚至成为了国人最熟悉的祭天符号。

#### 附表一：嘉靖朝所建明堂式建筑与西苑道教建筑（明堂式建筑以灰色标出）

时间	建□群	包含建□单体
嘉靖十四年(1535)	钦安殿(动工)	增建天一之门等
	千秋亭、万春亭(动工)	
嘉靖十七年(1538)	玄极宝殿(完工)	今中正殿香云亭
嘉靖十八年(1539)	天坛皇穹宇(动工)	
	大高玄殿(动工)	大高玄门、大高玄殿、九天应元雷坛殿、乾元阁
嘉靖十九年(1540)	天坛大享殿(动工)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崇智殿(动工)	崇智殿(五雷殿)、太玄亭、迎祥馆、集瑞馆、问法所
	雷霆洪应殿(动工)	坛城、轰雷轩、啸风室、嘘雪室、云雨室、耀电室、清一斋、宝渊门、灵安堂、精馨堂、馭仙堂、辅国堂、演妙堂

## 续表

嘉靖二十二年(1543)	凝道雷轩(动工)	
嘉靖二十二年(1543)	零坛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团城乾光殿(完工)	
嘉靖三十四年(1555)	紫皇殿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大光明殿(完工)	大光明殿、宣恩亭、飨祉亭、一阳亭、万仙亭、太始殿、太初殿、太极殿、统宗殿、总道殿、帝师堂、积德殿、寿圣居、福真憩、禄仙室、天玄阁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大玄都殿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延年殿	
	元熙殿	
	万法宝殿(重修)	天地亭
嘉靖四十五年(1566)	朝元馆	
	净席殿	
	真庆殿	
	紫宸殿	
	紫极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